

显灵

潘敦

部一样,品相也好,编号第68号。回到上海我翻看了那位书商网上店铺里的存货,毛姆的初版本、签名本竟然不少,刚看完的那部《寻欢作乐》也有,一样初版初印,作家题签送给一位叫“Fred”的朋友:“This is the first issue of this novel with won for won't on P.147.”(左下图②)那本书要价不菲,为了这句题词我咬咬牙连同另外两部毛姆签名的限量版小说《阿金》(Ah King)和《四海为家》(Cosmopolitans)一起要了。

《寻欢作乐》初版第一四七页上的错印,王强先生在他的《书蠹牛津消夏记》里提到过,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香港兰桂坊附近的乐文书店(Lok Man Rare Books)也买到一册《寻欢作乐》初版,他说这部初版有三处误印:“六十三页第二十二行最后一字漏印‘t’;一四七页第十四行最后一个字‘won’t’印为‘won’(一说:初版一刷同时亦有部分印对者);一八一页第四行第一个字‘it’印为‘in’。”毛姆的那句题词让“一四七页第十四行最后一个字‘won’t’印为‘won’”的说法,第一四七页,“won’t”居然没有漏“t”!真是幸运。

了断这桩“错印公案”那天L公子和王强先生正巧都在松荫里,都是见证人。我没有和王先生说《书蠹牛津消夏记》很早以前我就买过,真皮毛边本,舍不得裁开,一直没读,这次去曼谷前在香港三联书店又买了一册仿蛇皮的精装,塞在行囊里,等回了上海才偶然翻到他谈错印的段落。冥冥中带着这样的悬念在毛姆住过的酒店里读了三四天,悬疑里提到的小说更不是刻意安排,能了断这段公案很难说是侥幸,也许真是毛姆显灵。毛姆在东方饭店里住过的房间据说有两个宽敞的阳台,就朝看渭源河,我仿佛能看到毛姆先生坐在阳台的扶手椅上,看着河上的浆艇帆影,烟斗压住了他左边的嘴角,却压不住右边嘴角微微上翘。

二零二三年七月四日于松荫里

作家显灵的事最近还遇到过一桩。周克希先生手绘的插图本《小王子》本来四月“世界读书日”前预计面市,排版、审校延误,只能改期到六月一日儿童节;没想到书号申请又比预想费钱,新书首发日一推再推,从六月一日改成六月二十六日,再改成七月二日。六月二十九日插图本《小王子》总算从印厂送到画廊,出版社的编辑方小姐惊叹巧合,说那天是“世界小王子日”,也是作者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生日,原来是作家等着新版的《小王子》替他庆生,才有这多磨的好事,周先生的新书认定大矣!

七月五日又记

文学史上不少作家与笔下的人物荣损与共,有些作家与人物之间相爱相杀,比如伊恩·弗莱明与他创造的詹姆斯·邦德。年少时喜读侦探小说,往往只关注奇诡案情、破解谜团,鲜有留意小说人物与作者间的关联。不久前,国家典籍博物馆开设了一个“福尔摩斯大型沉浸式主题展”,竟使我不由自主地前去一探究竟。这个展第一次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亚瑟·柯南·道尔爵士与夏洛克·福尔摩斯之间的爱恨情仇。是的,这两个人物既相互增益、彼此成就,也曾长期互为抵牾,纠缠不休。展览入口处人头攒动,等待购票入场的人队伍时断时续,可见其热度之高。喜爱福尔摩斯的忠实粉丝自称“福迷”,而研究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学问也被冠以“福学”。据说在英国本土除了莎士比亚作品外,大概就属《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研究成果和读者最多。

维多利亚时代是大英帝国近代史上的黄金时期,殖民地遍布东西半球,一跃成为头号世界强国。与之相反的是1888年伦敦震动一时的开膛手杰克案凶手长期逍遥法外,使英国民众对警方的侦破能力信心锐减,人心思定。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恰在此时横空出世,正可谓时势造英雄。2002年10月16日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特别授予福尔摩斯荣誉研究员称号,以表彰其将化学知识应用于侦探工作的业绩。该学会选在贝克街的福尔摩斯雕像前举行了一个颇为隆重的授予仪式,但接受者却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拟人物。其实在世界各地的福迷中,至今仍具有相当比重的人坚信福尔摩斯是真实存在过的人,柯南·道尔不过是一位忠实的记者而已。围绕这一典型的名侦探角色,始终存在着真实与虚构的话题争论。柯南·道尔在创作夏洛克的时候,并非凌空蹈虚,而是充分结合实际的地理环境,将之塑造在伦敦西部贝克街租房而居,会乘坐四轮马车横穿迷雾笼罩着的泰晤士河的一位英国绅士。正是这种虚实结合的笔法,令很多读者一度以为“福尔摩斯”恰是生活在自己周遭的一位神探,使人读来饶有兴味。

福迷中的索隐派梳理出一整套柯南·道尔发表作品的时间线外另一条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生平年表。小说中的叙述者华生医生的记录中将每一个福尔摩斯经手的案件均标明了清晰的时间,为后人的整理工作提供了可能。于是1873年的“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案实际成了福尔摩斯

两三周前,有位友人直言不讳批评我:购书、存书、读书,唯求写文发表,不求写情可读——沧海取一粟,“弱水饮一瓢”,殊为可惜。

旧雨新知,可谓深中吾病。就拿购存十余年的《纪念刘季平文集》来说,每每浏览,只为撰写有关家乡的党史小文,我才选读数段。教育家刘季平(1908—1987),如皋双甸人(今属如东),陶行知先生的得意门生,曾任教育部副部长、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等职。故年累月,我尝试研读乡史与钱学,故了解钱锺书先生和如皋诗人冒孝鲁、英文编辑张沛霖的文人情谊。不曾想到,刘季平作为一名老革命,他及其家人还与钱锺书、杨绛伉俪往来甚多。这正是我近日通读《纪念刘季平文集》的意外发现。

那册纪念集入选《参加刘季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领导和生前好友签名录》,钱锺书、杨绛、艾青、严文井等作家诗人的签名赫然在列。杨绛的签字,一目了然了是钱先生的代笔。查阅《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1987年6月22日,刘季平的遗体告别仪式于八宝山举行,“习仲勋、方毅、胡乔木……赵朴初以及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钱锺书、杨绛伉俪是报道中的“各界人士”吗?他俩很少一起出席社会活动。我对两人出席追悼会的“事实”不免惊疑。至于钱锺书、杨绛结识刘季平缘由,我起初以为源自北京图书馆。刘季平早年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钱先生早年担任北京图书馆文借部顾问。范旭仑老师又有赐教:刘季平和钱先生同住三里河,同是1981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杨先生与北京图书馆也有缘。我于网上无意间淘得一册她的译本《小癞子》。此书印于1951年4月。书中前后钤有同一方蓝章:国立北京图书馆收藏。封底内页又钤:“1951(年)六月十二日 著者赠。”所谓“著者”即“译者”——杨先生于新书面世不足三个月,便馈赠一册与北京图书馆。

为进一步了解刘钱两家的交情,经双甸文史专家丁德全老师的引荐,我有幸结识刘季平、吴瀚夫妇的女儿刘爽。她一度在京侍奉母亲,情况很熟。她告诉我,上世纪30年代的杨绛、钱伟

一段珍贵的视频

——吴瀚为百岁师姐杨绛祝寿

彭伟



吴瀚(左)给师姐杨绛祝寿

长、高隽华、陈永龄、黄薇、郭建等清华校友,四十余年后陆续搬入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他们睽违已久,又劫后余生,结为邻里,都很高兴。吴瀚于1933年考入清华生物系,后转入历史系。她是杨先生的老同学,两人同住过清华的女生宿舍——静斋。朝花有同窗旧谊,夕阳又结邻新居,于是杨绛与吴瀚时有走动。1987年6月11日,刘季平病逝,家住三里河小区的好友纷纷登门吊唁。故而签名簿有两册,一册签于家中,一册签于八宝山告别仪式。钱锺书、杨绛伉俪就近为刘季平送行,签名写于刘府。次年盛夏,陶行知哲嗣陶成率领军庆市的一批孩子进京学习,吴瀚还登门邀请杨绛和孩子见面。

钱锺书先生辞世后,吴瀚常去杨绛家中坐坐聊。杨先生素来淡泊,不喜摄影拍照。有一位摄影记者想要拍摄杨先生,托请吴瀚沟通,随吴瀚行至钱宅门口,但最终未能入门。不过万事皆有例外。2010年7月18日,即杨绛百岁诞辰的次日,吴瀚率刘爽,以及儿子刘鲁、儿媳彭欣久(作家严文井的女儿),去钱家为杨先生祝寿。其间,刘爽、刘鲁姐弟俩“轮番上阵”,手持相机拍下了两段前后共约六分钟的

视频。

彼时出门前,吴瀚向家庭视频聚会上的家人宣布:“今天,一会儿我们要去给杨绛拜寿。杨绛是我清华的同学,比我大三岁,100岁了。”……吴瀚老人一手由刘爽撑着,一手拄伞作拐杖,略躬躬腰,慢慢地登上三楼。钱家的阿姨早已开门等候。吴瀚等通过过道进入客厅(又作书房)。临门右手边的墙壁前是两张黄色书橱,顶上安放钱锺书、钱瑗的遗照,及《钱锺书手稿集》。书橱前是一张褐色玻璃小圆桌,桌上有三瓶花儿,艳丽绽放。杨先生坐在进门对角的椅子上,两鬓花白,满脸笑容。就像自己的文字,她的着装朴素洁净:一条灰白色裤子配上深蓝色白格子短袖衫。杨先生让吴瀚坐在她左侧的沙发上,两位老同学时不时地侧身聊天。彭欣久给杨先生递上寿礼——一盒五指山出产的苦丁茶。杨先生侧头靠近吴瀚,一手扶稳茶叶盒,一手指向桌上,轻轻地说道:“那个无锡水蜜桃,给你带上几个。”刘鲁拍老人耳背,大声说道,茶叶外包装上写有“相期以茶”,祝愿杨先生生活过108岁。话音未落,杨先生突然像个要吃甜食的小孩,竖起茶盒紧紧地抱在胸前。

刘鲁、彭欣久又问杨先生还写作

吗,连问数回,杨先生些许耳聩,她指指耳朵,又指自己,解释着耳机,还是不大听见……那个装耳机的人给我说好,你得老戴,我不肯戴,我天天戴它干嘛?是吧?耳不听为净,我就不戴。”吴瀚一边听着,一边扇着一把五角蒲扇。严欣久用手向杨先生比划着先前的问题,并允诺只是随便问问。杨先生接道:“我写那个好像是”,随后“嗯”地停顿了片刻,又说道:“《文汇报》登的《俭为美德》,这是我写的。然后我又写了一篇《魔鬼夜访杨绛》,钱锺书不是有《魔鬼夜访钱锺书》……我还写了一篇《漫谈〈红楼梦〉》。”杨先生微微抬起头,双眼轻轻一闭,又说道:“另外我要写一篇《洗澡》之后。”期颐高龄写小说,严欣久颇为惊异,道出一口口腔揄扬老人的“壮举”。杨先生淡淡一笑,转向吴瀚,说老同学好福气,儿女双全,子孙满堂。

吴瀚提及下楼散步的话题。杨先生说:“我不大动了。”严欣久说:“我看您走得不错。”“走得不错,走得不错,我还能趴在地下”,杨先生且笑且言示范:上身前倾,伸出十指,向前压去。片刻之后,杨先生童心未泯,口中说着:“我能这样……”她已完全弯腰,双臂压向地面,再回身恢复坐姿。吴瀚竖起大拇指点赞。临离开前,刘家人又关心地问起钱先生的百岁生日怎么过的,杨先生说:“我的生日天气最热,又是一个人,我有个简单‘两便法’,告诉上门的或来电的朋友——我不摆酒请客,你们就替我吃饭,随便什么面,汤面、拌面、揪面、素面……吃了呢,就告诉——我给你吃了……朋友们都知道,问候时都说——我们为你的生活日吃面了!”刘家人听完笑着说:“今天我们回家也为你吃百岁面。”

我庆幸在今年杨绛先生冥诞前夕,获悉刘季平、钱锺书两家人的交游情谊。吊唁也好,拜寿也好,几个逝去的生活动片,借用杨先生的妙喻:“好比夕阳中偶尔落入溪流的几幅倒影”,而溪水中静静地流淌着杨先生的豁达恬静、孜孜不倦。

(本文材料由刘季平、吴瀚伉俪后人刘爽等提供,特此致谢)

与福尔摩斯共进退

史宁

人生第一个参与的案件,而按照作者发表时间的首个案件《血字的研究》则发生在1881年。两条时间线并行不悖,同时将作者与小主人公巧妙地扭结在一起。然而,福尔摩斯的探案年表却并非如想象中谨严,其中1892年的《威斯特里亚案》一案实际发生于福尔摩斯的“假死”期间,因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柯南·道尔一处明显的笔误。从以科学态度从事医学事业的身份来看,柯南·道尔本不应有如此失误,只能有一种合理解释,柯南·道尔似乎已对他笔下的福尔摩斯不再投入百分之百的热情与心力。这是一篇发表于1908年的小说,在此之前,作者已经不止一次对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产生厌恶,甚至欲除之而后快。

爱丁堡大学医学专业毕业之后,柯南·道尔自负满怀地写道:“我就是觉得我能到任何地方,能干任何事情。”然而现实的境遇是,他后来写成的《血字的研究》发表之路颇为曲折。正在开私人诊所行医的柯南·道尔其实寥寥,为了打发时间始写侦探小说,可是接连遭到两家出版社的退稿。在寄往第三家出版社之后,戏剧性的转机出现了,出版社主编无暇审稿,是他妻子慧眼识珠极力推荐这篇稿子,才使福尔摩斯出现在世人面前。只是出版社并未特别重视,仅将小说定位为廉价的惊险文学,这令柯南·道尔心生不悦,加之反响平平,于是柯南·道尔转向历史小说的创作,将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统统抛诸脑后。但另一家出版社看到《血字的研究》后大为欣赏,约请柯南·道尔再写一本有关福尔摩斯探案的小说并提前支付了大额佣金。其时柯南·道尔刚刚完成一本历史小说,家庭开支也捉襟见肘,只得重新拾起快要淡忘的福尔摩斯先生,写出了《四签名》,获得瞩目。

真正令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名声大噪的是《海滨杂志》的创刊,柯南·道尔为这本杂志连续写了六个福

尔摩斯探案的短篇故事,福尔摩斯的神探形象很快成为英国文学和大众读者眼中的知名人物,出现开口不谈夏洛克、读尽诗书也任然的境况。杂志趁势约请柯南·道尔继续写作此类小说,但他本人并不积极,甚至一度想终止创作。幸亏他的母亲极力劝说,柯南·道尔才暂时打消这一念头,又写出六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并提高了稿酬。在此期间,他关闭诊所,专事写作。面对《海滨杂志》的反复夹攻,柯南·道尔勉强答应再写12个故事,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抬高稿酬,以1000英镑的高价逼退对方。然而杂志社却满口答应,对作者的要求一律满足。

实际上,柯南·道尔对福尔摩斯早已热情不再,他因写作历史小说屡屡被福尔摩斯所打扰而深恶痛疾。1892年7月,他甚至同时写作包括福尔摩斯探案在内的三种不同题材的作品。他日益感到福尔摩斯占用和浪费了太多从事严肃文学写作的时间。在与母亲的通信中,柯南·道尔直言:“我正在写最后一篇福尔摩斯故事,写了一半,写完之后这位绅士就会消失,再也不会出现了。我对他的名字都感到厌倦。”这就是后来的《最后一案》,柯南·道尔假借夏洛克之手,使其与福尔摩斯二人在瑞士莱辛巴赫瀑布的悬崖边扭打,最后双双落入深渊。这一次柯南·道尔母亲最终没能再挽救福尔摩斯。

柯南·道尔生于苏格兰一个文艺家庭,他兼具运动员与冒险家气质,是板球冠军和专业拳击手,身上饱含骑士精神。但柯南·道尔最喜欢的还是文学,他崇拜历史小说家司各特与史学家麦考莱。尽管一度受到爱尔兰黑色、恐怖与怪异作品风格的影响写出了《血字的研究》,但他始终认定司各特的《艾凡赫》才是文学的正宗。这就导致他的侦探小说越受大众读者追捧,柯南·道尔内心越排斥福尔摩斯,他感到这个人物正在逐渐扼杀他的创造力,并夺走了创造者的生命,限制住了他真正的才华,使他无法翰

墨生辉真正在文学事业上大展宏图。在柯南·道尔看来,侦探小说终究是取悦大众的市井娱乐,难登大雅之堂,甚至是一种堕落。而公众则为福尔摩斯这一人物的真实与鲜活所倾倒,这位个性十足的侦探仿佛是神赐的英雄,是时代精神的化身,黑暗中的希望,为他们抵御着伦敦城内外一切的罪恶与丑行。当他们听闻福尔摩斯的死讯自然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抗议,他们示威,他们对作者恐吓谩骂,他们向杂志社施压。柯南·道尔并未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他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自由,终于得偿所愿写作其他非侦探作品。然而吊诡的是,柯南·道尔此后虽相继写出了历史小说《白衣军团》、纪实文学《南非的战争:起源与行为》与科幻小说《失落的世界》等作品,但读者热切呼唤的还是福尔摩斯,对其他作品视若无睹。面对《科利尔杂志》13个故事九千英镑的稿酬,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坠崖十年后以一篇《空屋》宣告了神探的复活。

福尔摩斯似乎再次战胜了他的创作者,柯南·道尔或许也意识到自己比笔下的角色更加渺小,曾经的傲慢与自负到头来仍然要向福尔摩斯屈服,他身上的所有光彩尽被这个侦探角色所遮盖。虽然依旧感到自己如囚徒般被主人公禁锢,但他也在努力尝试同福尔摩斯和解,不再固执地要消灭他。在后面的故事中他选择让福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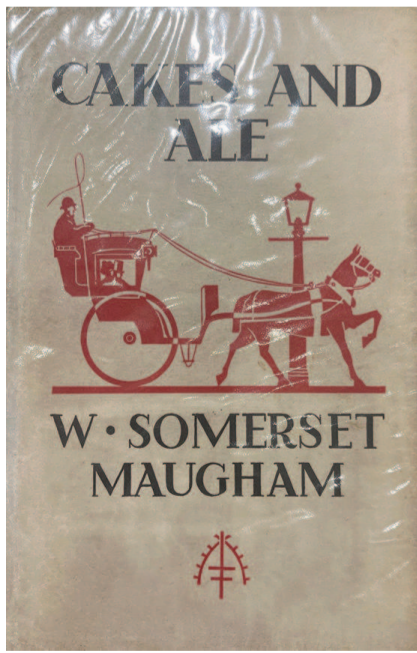
摩斯到乡间赋闲,过着退休生活,偶尔再接几个案子。神探的冒险旅程以一种自在随性的方式继续着。福尔摩斯再也无法死去,只能退隐。柯南·道尔一边延续着福尔摩斯的探案历程,一边仍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为福尔摩斯的退场做各种尝试。从《最后致意》的副标题“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收场白”到《新探案》的序言,作者屡次向读者做出与福尔摩斯告别的姿态,甚或带出些许乞求的姿态。或许他认识到自己步入老境,笔下的人物也不可能永葆活力,要为福尔摩斯先生选择一种相对体面的退场方式。抑或晚年的柯南·道尔极度沉迷于通灵术,已丧失了写作探案故事的精巧能力。他要与福尔摩斯共进退。

最后岁月里的柯南·道尔大概认清福尔摩斯终究是无法被消灭的。他看似暂停了福尔摩斯的生命时间,但无形中却扩展了福尔摩斯的传播空间。1930年7月7日,与福尔摩斯经历42年陪伴与冲突的柯南·道尔离世。他是医生、灵学家、诗人、冒险家、戏剧家、运动爱好者,他更是福尔摩斯的创造者。他以天才般的巨笔创造出的这一典型人物,自1900年至今,被改编成数以百计的影视作品搬上银幕与舞台,成为迄今最为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伴随着一代代插画师与表演者的再度塑造,头戴猎鹿帽,口衔烟斗的福尔摩斯早已在世界各地深入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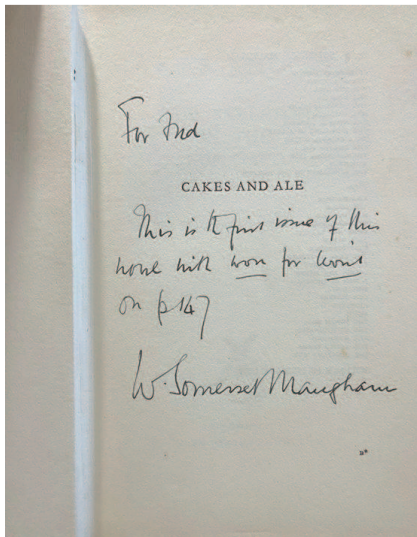
标榜理性至上的柯南·道尔骨子里当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读《血字的研究》后半段故事时,因以犯罪者为爱复仇万里追凶的大义感动涕泣。

文学史终究记住了写出侦探小说圣经的柯南·道尔,就像记住了像各特、狄更斯与菲尔丁一样。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恰如两面镜子般时刻映照着彼此,步入永恒。

2023.6.15



①初版《寻欢作乐》的封面



②毛姆在书上的题词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